

葛浩文翻译研究

刘云虹 主编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总主编 许钧



南京大学出版社

葛浩文翻译研究

刘云虹 主编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总主编 许钧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浩文翻译研究 / 刘云虹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 许钧主编)

ISBN 978-7-305-20982-6

I. ①葛… II. ①刘… III. ①翻译理论-文集 IV.
①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367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总 主 编 许 钧

书 名 葛浩文翻译研究

主 编 刘云虹

责任编辑 顾舜若 张 静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46 字数 534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982-6

定 价 11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

(16BYY009) 阶段性成果

进入新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特征,翻译在主流对象、方式、工具与手段、方向以及内涵与外延等方面都发生着深刻改变^①,尤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翻译路径呈现出显著的变化。以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研究层面,翻译界主要把目光投向“外译中”,对翻译的关注也往往基于对我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的考察与反思。目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是我国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正符合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许钧曾就中西古今关系之变下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在民族复兴的振兴语境中,新世纪的中西关系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诉求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②。在谢天振看来,“就像1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网购居然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主要的购物方式一样,今天翻译所发生的变化同样也可与之比拟”,“翻译巨变”之一就是“两千多年来以译

① 谢天振,《翻译巨变与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从2015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谈起》,《东方翻译》,2015年第6期,第5页。

② 许钧,《中西古今关系之变下的翻译思考》,《中国外语》,2015年第4期,第1页。

入行为为主的翻译活动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翻译领域不再是译入行为的一统天下,民族文化的外译也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翻译活动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① 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文学的外译是必经之路,因此,在多元文明与文化交融互鉴的共同诉求下,在中外文化交流日趋深入的历史语境中,“中译外”在翻译活动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作为语言、文化、历史、社会及意识形态等多种要素作用与影响下的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随着方方面面新变化的凸显,也日益彰显出其复杂性与丰富性。因此,近年来,中国文学外译在引发普遍关注的同时,已成为翻译界、文化界探讨与思考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在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与研究中,美国翻译家、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名字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也不应被忽略的。

无法被忽略,因为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与研究。葛浩文 1970 年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71 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继续博士阶段的学习与深造,师从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柳无忌先生,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后确定以萧红研究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1976 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专著《萧红》,1985 年,该书被译为中文并以“萧红评传”为题出版,2011 年,在首届“萧红文学奖”评选中,葛浩文以《萧红评传》获得萧红研究奖。自 1974 年受聘于旧金山州立大学起,葛浩文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三十余年,其间发表学术文章,创办并主编学术性刊物《中国现代文学》,主编或参编多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选集,研究范围

① 谢天振,《翻译巨变与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从 2015 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谈起》,《东方翻译》,2015 年第 6 期,第 5 页。

“由萧红扩展到以萧军和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继而转到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直至包括港台地区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①。葛浩文对中国文学持续而广泛的关注与探索,不仅大大推动了美国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为其中国文学译介奠定了坚实基础。

无法被忽略,因为他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葛浩文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共同源自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从1974年首次发表译文至今,他先后翻译了朱自清、萧红、杨绛、王蒙、端木蕻良、张洁、白先勇、贾平凹、莫言、王朔、虹影、苏童、毕飞宇、姜戎、老舍、刘震云、阿来等近三十位中国作家的五十余部作品,其中以小说为主,也包括一些散文和诗歌。正如有学者所言,“葛浩文的翻译书单如同一本中国当代作家的‘名人录’,不仅译品数量众多、选择精细,而且翻译功力深厚、文学性强”^②。因其在中国文学译介上的重要成就,葛浩文获得“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年度翻译奖”“古根海姆基金”“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多项荣誉,其译作也多次斩获“曼氏亚洲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奖项^③,更被夏志清先生誉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2012年,在葛浩文及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法语译者杜特莱夫妇、日语译者藤井省三等多位翻译家的助力下,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在其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文学界经历数十年焦虑等待的“诺奖情结”也终于有了着落。在他们之中,由于英语在全球无可比拟

① 吕敏宏,《论葛浩文现当代小说译介》,《小说评论》,2012年第5期,第5页。

② 覃江华、刘军平,《一心翻译梦,万古芳风流——葛浩文翻译人生与翻译思想》,《东方翻译》,2012年第6期,第42页。

③ 同上。

的地位,葛浩文自然是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无法被忽略,因为葛浩文的翻译不仅是中国文学外译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功个案,更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背景下引发了国内学界对翻译问题广泛的关注、探讨甚至争议,折射出涉及翻译的诸多根本性问题。有学者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莫言该不该获奖的问题,另一个是莫言凭什么获奖,或者说为什么获奖的问题。”^①其中第二个问题可以说正与翻译密切相关。目前汉语在全球范围内的非主流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阅读与接受必然依赖于翻译。尽管莫言作品本身的精神价值、艺术魅力与东方文化特质等对其获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译介在一定程度甚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莫言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并最终助力莫言获得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国际认可,这同样毋庸置疑。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一经揭晓,国内媒体和学界都不约而同把莫言的获奖首先归功于翻译,认为葛浩文、陈安娜等莫言作品的主要译者在其获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王宁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和陈安娜将他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无缘。^②莫言本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其获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

虽然葛浩文的名字因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与有力推介而早已被熟知,但葛浩文在中国学界最绚丽的出场无疑得益于莫言

① 曾艳兵,《走向“后诺奖”时代——也从莫言获奖说起》,《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88页。

② 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7页。

获得诺贝尔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界对翻译重要性的空前关注、对翻译相关问题的热切探讨。除了各界对葛浩文翻译贡献的肯定和赞誉之外，他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特色鲜明的翻译方法也是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引发了翻译界、文学评论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热议。一时间，在众多媒体上，“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翻译策略俨然成为葛浩文翻译的标签，葛浩文式的翻译也几乎被看作中国文学外译中成功翻译的代名词。然而，围绕所谓葛浩文式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各界存在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尤其在文学界和翻译界这两个与中国文学外译最直接相关的领域，尽管两者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高度一致的目标与愿望，但在翻译方法、翻译观念等翻译根本性问题上却存在迥然相异的认识。有文学评论者对翻译的“包装”和“美化”作用及阅读翻译这一“象征性文本”可能导致的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误读深感忧虑并提出质疑，认为由于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①文学评论界甚至有观点从伦理层面对葛浩文式的翻译提出谴责：“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②某些汉学家也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颇有微词，如顾彬认为葛浩文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因为“他

①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报》，2013年1月10日。

② 李建军，《为顾彬先生辩诬》，《文学报》，2014年2月13日。

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立场”。^①相反,翻译界多有对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加以推崇的声音,部分学者甚至将其视为译介与传播中国文学唯一可行的翻译策略,并据此呼吁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转换翻译方法,认为传统译学观念是“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基础上的”,“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的行为和实践”^②,进而明确提出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时“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③。基于这样的立场,有媒体甚至将矛头直指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做翻译就要‘忠实于原文’,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常识。但沪上翻译界的一些专家却试图告诉人们:常识需要更新了!这种陈旧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并明确提出,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成功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④

我们知道,文学译介活动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就围绕葛浩文翻译的种种关注、探讨与争议,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并思考。首先,葛浩文的翻译是否应被定性为“连译带改”式、有悖于翻译忠实性原则的翻译?其次,如果说葛浩文的翻译方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翻译忠实性有所违背,那么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上升为中国文学

① 李雪涛,《顾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三题》,《文汇报读书周报》,2011年11月23日。

② 谢天振,《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14页。

③ 张毅、蔡亮,《从莫言获诺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7期,第55页。

④ 樊丽萍,《“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文汇报》,2013年9月11日。

外译中唯一正确的方法与模式,并据此对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质疑,这是否合理?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要排除任何印象式或人云亦云的主观判断,真正深入文本,通过细致的文本对照有理有据地加以分析,同时应充分认识翻译“忠实”概念的不同层面与维度,并结合影响翻译行为的文本内外诸多要素进行全面考察。葛浩文在回答关于翻译标准的提问时,曾表示:“忠实是大前提,也必须以读者为中心。”^①这个回答在某种程度上颇能说明问题,一方面葛浩文对翻译忠实性有自己的理解与追求,这从他选择重译老舍的《骆驼祥子》可见一斑。之所以要重译,正是力求忠实地再现老舍作品的精神价值和美学趣味,因为在他看来,几个已有的译本要么“完全歪曲了原著”,要么“没了老舍作品的味儿”。^②另一方面,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趣味是葛浩文在翻译中进行删改,或更准确地说,是葛浩文应译文编辑、出版商要求对原著进行删改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译介与传播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读者接受是其中必然被考量的要素。

第二个问题则不仅与如何认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有关,与如何把握翻译观念、翻译价值和目标等深层次的问题有关,更深深关涉到能否真正从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与文化双向交流的宏观视野来看待中国文学外译中的文化交流不平衡性、文学接受阶段性等问题。对此,译学界力求通过进一步思考,澄清目前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进而推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如许钧从文学译介活动中“无法避免

① 孟祥春,《“我只能是我自己”——葛浩文访谈》,《东方翻译》,2014年第3期,第47页。

②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第50页。

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出发,指出“如果将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绝对化、唯一化和模式化,甚至据此质疑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也无益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深层次意义上来讨论翻译的作用和价值等根本性问题”。^① 另有学者认为,各界就葛浩文翻译方法的探讨与争议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受到学界和文化界普遍关注与空前重视的同时,翻译在种种现实问题下无疑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②,并呼吁译学界充分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翻译遭遇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从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对翻译方法、翻译观念、翻译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展开深入思考,为实现不同文化间平等而长远的交流创造条件。

不难看出,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葛浩文的翻译因其对中国文学外译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也因其翻译本身呈现出的鲜明特色,不仅引起了热议,更引发了思考,既有译学界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对涉及翻译的诸多根本性问题的深入反思,也有各界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翻译的价值和作用等具有深层次意义的问题的探讨。从呼兰河畔“热泪纵横”的萧红迷,到没有翻译“就不能生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再到作者与译者“不安而脆弱”的关系中“我行我素”的葛浩文,汉学家葛浩文及其翻译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史上最为重要的个案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个案层面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如何从整体上认识与把握这一重要个案,进而在此基础上探寻与构建其对于中国文学外译可能存在的普遍意义? 唯一可靠的路径就是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葛浩文的翻

① 许钧,《“忠实于原文”还是“连译带改”》,《人民日报》,2014年8月8日。

② 刘云虹,《翻译的挑战与批评的责任》,《中国外语》,2014年第5期,第90页。

译就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文学译介活动的方方面面,对葛浩文翻译的研究也因而具有多重意义,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加强“中译外”研究,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必然呼唤译学界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学译介活动与成果进行深入考察;其二,有助于译学界对中国文学外译实践与研究中凸显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其三,有助于译学界从历史维度对翻译方法与译介效果进行整体把握;其四,有助于译学界在全面考察从翻译选择到读者接受的整个翻译过程基础上,深化对重要翻译家作用的认识。

基于此,这部《葛浩文翻译研究》遴选了国内葛浩文翻译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力求呈现出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与整体样貌。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上编“翻译理念与原则”、中编“翻译策略与方法”、下编“翻译文本分析”以及附录“访谈与评述”。

上编“翻译理念与原则”着重对葛浩文翻译观、翻译思想与翻译原则进行探讨。所选论文主要通过具体实例分析或重要文献解读,结合葛浩文的生平及文学翻译实践经历,对葛浩文翻译观、翻译思想与翻译原则进行整体的观照与把握。各篇论文普遍认为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与其翻译理念、翻译思想密切相关,是良好的翻译理论意识指导下的一种理性行为,并着重从文学翻译的本质、文学翻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文学翻译的文本选择、译者的角色与社会地位、文学翻译的读者因素及翻译出版商与编辑的干预等方面考察与评价葛浩文的翻译观与翻译思想,同时对葛浩文翻译实践中采取的在尽可能保持原文风貌基础上注重译文可读性的易化原则加以探讨。此外,本编论文还分别从翻译与东方主义、翻译与语言变异以及全球视野与文化身份、译者行为、翻译过程等不同视角对葛浩文的翻译态度、立场、动机及其影响下的种种翻译选择进行考察与分析,并探究葛浩文翻译对中国文

学“走出去”的多重意义,其中既有共同的认识与理解,也不乏某些相异观点的直接交锋。

中编“翻译策略与方法”主要关注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策略、方法及其译文呈现出的个人风格与基本特征,但各篇论文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① 以葛浩文翻译个案为例,着重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的译者模式、翻译策略进行宏观探讨与整体把握,既对汉学家译者模式及着眼于“准确性”“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的葛浩文式归化译法给予肯定,也对某种将葛浩文翻译方法绝对化或模式化的倾向提出质疑与反思。② 立足于对葛译莫言小说的总体考察,或从细致的案例分析入手,揭示译者在内容细节与叙述手法上采取的调整策略,或借助语料库等研究途径,关注葛浩文翻译中凸显的译者风格,并剖析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③ 对葛浩文翻译中的“误译”问题加以探究,部分观点认为所谓“误译”实则是译者突破文字束缚,通过创新性重构的策略,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实现对原文更好的忠实,同时促进了翻译跨文化交流目标的达成;另有论述则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专门考察并分析葛译莫言小说在方言处理上的失误及其原因,力求引起学界对葛浩文翻译更为客观的探讨与反思。④ 通过考察葛浩文译介莫言小说过程中采用的回顾式编译法,揭示译文编辑和出版商对文学译介活动的隐形制约因素,并借以探寻文学外译中的作者—译者—原/译文编辑合作机制,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参考。⑤ 基于对部分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中意象话语翻译的考察,从发展的角度探讨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并就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

下编“翻译文本分析”侧重对葛浩文代表性译著进行文本分析。实践性是翻译的根本属性,因此以文本为归依、以方法为对象必然是

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特别在对葛浩文翻译这一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现象”甚至“事件”的代表性个案的研究中,唯有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与探讨才能避免印象式或标签化的评判,也才能切实深入翻译过程,力求客观地揭示翻译之“真”。总体来看,本编收录的论文呈现出以下特点。①以某部具体翻译文本,尤其是葛浩文最重要的译本为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莫言的代表性小说,兼有杨绛、毕飞宇和阿来等重要作家的作品。②通过对葛浩文译著的文本分析与整体把握,从叙事模式的转变、概念隐喻的处理、异化与归化策略的灵活运用、“陌生化”翻译准则的遵循及译者主体性发挥等多重角度,结合副文本、翻译过程、翻译诗学等不同路径,揭示译本的整体风格特征并探讨葛浩文的文学翻译方法与策略。③从文本分析出发,借助葛浩文翻译个案研究,以更为宏观的视角观照译者—作者—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及翻译与世界主义、文学文化民族性等问题。

附录中选编了关于葛浩文翻译的部分访谈与评述,主要包括《中华读书报》《外滩画报》《文汇报》等国内媒体对葛浩文的采访,学界对葛浩文与林丽君的访谈,另有葛浩文本人关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外译的评论。该部分以问答或评述的直接方式,对葛浩文文学翻译的理念与原则、策略与方法、目标与选择以及这位著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及其译介与传播问题的认识等方面均有所涉及,并且更为鲜活地展现了葛浩文翻译实践经历中的各种酸甜苦辣,或可成为学术研究之外的一种有益参考与补充。

应该说,在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中,葛浩文翻译研究凸显出鲜明的时代意义。这一研究涉及翻译文本、翻译原则与策略、翻译理念与目标等多方面的内容,深层次考察了这位对中国文学

外译做出杰出贡献的汉学家、翻译家四十余年的翻译实践经历与成果,力求系统回答翻译个案研究所涉及的重要问题:他翻译了什么?他如何认识与理解翻译?他是如何翻译的?他为什么如此翻译?同时,在新时期翻译路径等发生重要变化、译学界普遍关注与探讨如何重新定位翻译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对进一步理解翻译本质、认识翻译功能、把握翻译价值、深化翻译理论构建等具有积极的启示与推动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反思并促进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这样的研究必须依赖于细致的文本分析、深入的理论探寻,更需要一种批评的目光。丰富的翻译实践活动,尤其是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这样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既是翻译理论研究得以深化、发展的源泉,也必然呼唤翻译批评的在场与介入。作为“联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一条重要纽带”,翻译批评不仅是沟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桥梁,更是促使两者形成积极互动的推动力。以批评的理性目光关注翻译实践与翻译重大现实问题,从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的高度认识与理解翻译及其涉及的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标准、文化立场和价值重构等重要问题,从而推动翻译事业健康发展,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这是翻译研究者与批评者的共同责任所在。

刘云虹

2018年9月

001	主编的话
001	上编 翻译理念与原则
003	葛浩文翻译观探究 / 文军、王小川、赖甜
016	从几篇重要文献看葛浩文的翻译思想 / 孙会军
033	论葛浩文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 / 吕敏宏
053	一心翻译梦, 万古芳风流——葛浩文的翻译人生与翻译思想 / 章江华、刘军平
078	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 / 曹顺庆、王苗苗
089	Glocal Chimerican 葛浩文英译研究 / 孟祥春
112	论葛浩文翻译本质之论——兼谈译学界“翻译本质”之争及其启示 / 周领顺
127	葛浩文翻译再审视——基于翻译过程的评价视角 / 许诗焱
143	葛浩文翻译思想的“对话性” / 谢露洁
161	中编 翻译策略与方法
163	拿汉语读, 用英文写——说说葛浩文的翻译 / 张耀平
173	从小说语言形象显现看葛浩文先生小说翻译的形象再造 / 吕敏宏
186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 / 胡安江
205	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 / 邵璐
222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译者风格分析——以莫言小说英译本为例 / 侯羽、刘泽权、刘鼎甲
240	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 / 刘云虹、许钧